

五十年文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十年文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五十年文萃: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 /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81074-254-X

I . 五... II . 内... III . 社会科学—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974 号

书 编 者	名 称	五十年文萃
任 编 者	内 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	
责 任 编 者	石 斌	
封 面 设 计	丹 森	
封 面 题 字	康 庄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 和 浩 特 市 大 学 西 路 235 号 (010021)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 蒙 古 民 族 印 刷 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5	
印 数	1—1000 册	
字 数	400 千	
版 期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ISBN 7—81074—254—X/G·27	
定 书 号	全套(24 册): 精装 768.00 元, 平装 648.00 元	
定 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

布赫

新世纪伊始，内蒙古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 50 岁华诞。为庆祝建系 50 周年，师大汉文系出版了大型丛书——《五十年文萃》。这套丛书集中了汉文系 50 年科研、教学与创作的主要成果，反映了汉文系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看到此书，如临故土，如闻乡音，倍感亲切。欣喜之余，我很想为这套丛书写上几句话，以示祝贺。

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在内蒙古地区建系最早，是全区中学语文教师的摇篮。尽管内蒙古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汉文系全体员工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源源不断地向全区乃至全国输送了一批批合格人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作为内蒙古人，感谢你们多年来付出的辛勤劳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经过 50 个寒暑春秋，我欣喜地看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校内教师力量强大，学科建设完备，科研成就显著，学生人数众多的龙头专业。在新的世纪里，师生们正

以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改变着内蒙古教育的落后面貌。我相信，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繁荣和发展，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成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富有开创精神的专业，并进入我国该专业高等师范教育的先进行列。

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地方。我以为，除了教育和培养职能之外，大学还应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综合性大学应该如此，师范大学亦应如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性大学科研氛围、力量与条件较之师范院校要强。但是，我感觉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没有受此影响，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科研活动中，兢兢业业，自强不息，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举手投足之易。汉文系的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以做“知识人”为乐，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耐得住寂寞与清贫，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师应有的精神品格。在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的今天的学术界，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精神，才使他们在条件有限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科骨干，产生了相当丰厚的科研成果。我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据我所知，内蒙古各大学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套像师大汉文系这样规模庞大、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学术性强的丛书。汉文系此举，让人感到那里的学术气氛是浓厚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看得出汉文系的领导集体

堪称教育事业的“有心人”，他们以新的观念引导着这个集体，努力培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尽量为教师们的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使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没有理想，没有勤奋，没有学识，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便无所谓教育。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精进不休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扬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教师并不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位教师只要上好课便完成自己的天职了。这实乃一种偏见。我希望，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们借鉴一下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经验，谦虚谨慎，重视科研，从而使教学与科研比翼双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书，育好人。

《五十年文萃》证明了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学术研究实力。丛书精选了汉文系 50 年来，特别是目前在职的教师们多年辛勤钻研的成果，共 24 卷，近 1000 万字，其中包括论文、专著和创译三部分。

丛书中所收的学术著作、论文囊括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各个领域，从语言到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观的解析；在文学实践的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包括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从古代汉语的虚词，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此外，对中外文化、中国书法艺术、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总之，丛书中所收专著与论文，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度、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的理念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创新的学术眼光。

丛书创译编有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和翻译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此编虽然数量不多，又是业余的创作，但足以表明汉文系教师良好的文学修养、外语水平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文学创作也日益商品化了。但我感到，丛书所收作品并没有商品的味道。创作者严守着一条准则：为人生而写，为理想而作。我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就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我建议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都来读一读，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着写一写，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这是一套值得肯定的、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丛书。我相信，这套书籍不仅会推动内蒙古的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教育及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知道，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在努力，成果还会一天天增加，成绩还会一天比一天昭著，我真诚地期待着师大汉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值此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002 年 3 月

《元代杂剧肇论》小引

王志民

古人为某一著作写序引，往往在评价该著作的同时，又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于元杂剧并无研究，更谈不上有什么高论和体系。所以，自允诺为登庸君此书写序引之后，便终日惶惶不安了。从而又想起了清人程世爵《笑林广记》中，“瞎子吃鱼”的笑话：众瞎子打平伙吃鱼，打算煮鱼汤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鱼，活的鱼就扔到了锅里。鱼儿蹦到锅外，他们也不知道。水烧沸后，大家围在锅前，一面喝汤，一面赞道：“好鲜汤，好鲜汤！”突然，一个瞎子的脚碰到了地上的鱼，便惊呼道：“鱼没在锅内！”众瞎子叹道：“阿弥陀佛！亏得鱼在锅外，若在锅内，大家岂不要鲜死了！”我既不愿象“瞎子吃鱼”似的，强不知以为知，瞎胡吹；也不能说一无所知，教授嘛，打个“擦边球”，听听喝采声，也不是没有见过；更不愿此书因我而精华未显，登庸君岂不是明珠暗投？怎么办呢？开弓是没有回头箭的，勇往直前才是出路。于是又想到了王充《论衡·实知》中的名言：“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然后谨遵“南容三复《白圭》”之古训，憋足劲埋头研读这部书稿及有关著作，以期收到谨言慎行、无伤大雅之效。竟而韦编尚未三绝，而抽烟已过五包矣。天诱其衷，小有所得；虽不敢言开物成务，而亦可勉强塞责了。

登庸君是六十年代末毕业的本科生，又是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在其当研究生和其后的十五年教学过程中，一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尤以元杂剧研究最为擅长。这部《元代杂剧肇论》，便是其厚积薄发的一部分。书中涉及的问题较多，但是，

面虽广而有所侧重，帙不繁而意义颇大。其中有研究元杂剧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的，也有探讨其艺术性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章新什，无不理事相契，言意互发。教学中之一得，已属不易；涓滴汇合，而成溪流，反过来又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是我辈教书先生所倡导的。不过，平心而论，这一类的成果，尚未达到学术前沿的水平；而具有研究领域的突破性和学术价值的，乃是其对元杂剧方言俗语和蒙古语词的研究，这才是本书的重头戏及其贡献。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以及特殊的文化背景等原因，内蒙古西部等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古代白话词语和语法结构，利用这些来解释元杂剧中的某些词语，就更能准确地把握其含义。这是前辈专家未能深入研究或未曾涉及的课题。登庸君借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优势，又认真地对内蒙古西部等地区的语言进行了反复调查，并运用其语言学和文学知识，特别是利用特殊地区的语言继承的特殊性，去研究元杂剧的方言俗语和蒙古语词，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补充论证了前辈们对元杂剧某些词语在释义上的不足之处，有的则纠正了他们的臆断和误释，遂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同时，登庸君也并不以自己的研究方法为唯一可靠的方法。他一方面肯定了前辈们研究元杂剧方言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一方面又主张溯源旁证、以曲证曲和方言证明等三法并用，综合研究；而用北方某些地区活着的民间方言俗语去诠释元杂剧的某些词语，只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研究途径。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至于本书中的诸多释例，是完全符合元杂剧的实情，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见智见仁，自古而然。即使持论相左，也会在争论中促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学术的发展。此外，尚有不可忽视的是，关于方言俗语成为元杂剧戏剧语言的原因，元杂剧中方言俗语的特色与作用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内蒙古西部地区何以保留了大量的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等等，书

中皆有所探讨，并给以理论阐释。或采旧说而名侔实易，或自我作故而理顺义彰，发皇耳目，启人良多。相信读者自会辨而识之，且会抃风舞润的。

说了这许多话，能否免去“瞎子吃鱼”之讥，尚不得而知。不过，我是真的把鱼放到锅内煮好而后品尝过了。登庸君在本科和当研究生的学习期间，我有幸任其七年班主任之职，因此，狂瞽之论，不妨谈笑于肘腋之下。所虑者，乃我并非生公说法之辈，而持布鼓径过雷门之内，恐将贻笑于目击道存者之前也。

1996年冬，于内蒙古师大莲东寓所

目 录

《元代杂剧肇论》小引.....	王志民(1)	
方言俗语成为元杂剧戏剧语言之原因初探.....	(1)	
关于元杂剧方言俗语之研究		
——兼及内蒙古西部区方言俗语对元杂剧方俗		
研究诠释的作用	(11)	
元杂剧方言俗语之特色探微	(29)	
论方言俗语在元杂剧中的作用	(40)	
汉语中的元代蒙语语词	(55)	
元杂剧方言俗语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65)	
元杂剧中的少数民族语词	(73)	
内蒙古西部地区保留大量元杂剧中		
方言俗语原因初探	(89)	
衬字与增损.....	(110)	
“也么哥”之我见.....	(115)	
“撒和”新释.....	(118)	
曲的产生与影响.....	(121)	
《窦娥冤》的现实主义成就.....	(128)	
关于窦娥形象的塑造.....	(134)	
面黑心红, 光彩照人		
——关于《陈州粜米》中之包拯		(140)
《陈州粜米》中包拯形象塑造之我见.....	(147)	

向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处开掘

——《陈州粜米》包括形象再议	(154)
《西厢记注析》前言	(164)
《西厢记》的艺术美	(181)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187)
附：	
再说“郑风”	(193)
中国文学的第一块丰碑——《诗经》	(203)
珍珠，在诗的王冠上闪耀	
——《楚辞》赏析	(209)
《陌上桑》的艺术特色	(213)
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少数民族妇女的光辉形象	
——读《羽林郎》	(219)
乐府三题	(226)
在《史记》千姿百态的人物群林中漫步	(231)
《史记》的文学成就	(236)
东晋荒漠诗坛的一丛兰花	
——读陶渊明的田园诗	(243)
柳永长调《雨霖铃》赏析	(248)
后记	(253)

方言俗语成为元杂剧戏剧 语言之原因初探

元代杂剧，作为一代文学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华，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短短百十年间，知名的作家就有二百多人，更有那么多不知名的作家；已知的剧本有六百多种，不知名而散佚的不知凡几。剧本广泛流传，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争相演出，倾城空巷，吸引了广大观众。杂剧已成为元代独步文坛的一种文艺新形式。我们认为，这种空前盛况的出现，除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杂剧内容反映了现实生活、群众愿望，杂剧形式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杂剧中的语言运用，也即王国维先生所说“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①。这种“新言语”就是与“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②的传统正宗文学大相径庭的方言俗语。

方言，即地方之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分支或者地方变体。俗语，是指流行于民间通俗的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俗语本来也带有方言性质，它包括俚语、谚语、成语、歇后语等。生活中的方言俗语是人民大众口语中常见的词句。一般说来，方言俗语比较精炼、生动、富有表现力。元代方言俗语，是指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大约相当于今天华北地区人民所使用的方言俗语。严格地说，方言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应包括语音、语词和语法这三个方面。但本文所说的元杂剧的方言俗语，习惯上仅就其语词而言的。另外，也包括一部分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语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的诗、词、歌、赋被视为文坛正宗，民间文学虽然一直存在，总是被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小技而不屑一顾。在文艺领域里，仅占极次要的地位。至元代，以北方民间口语方言为主要材料的杂剧，象突兀的奇峰，一跃而为当时的主要形式。影响之大，是当时其它文学形式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这一文学现象，有不少专家曾努力探索过它骤然兴盛的原因。但是，作为元代杂剧重要特点之一的大量方言俗语，却很少有人进行认真、深刻的研究。下面，我想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戏剧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戏剧语言在戏剧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演员上台表演，通过语言（唱词和宾白）介绍人物身份，揭示矛盾冲突，推进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一件事情，表现作家态度，从而使观众得到教益或享受。戏剧对语言有严格的要求。古典戏剧亦然，它要求戏剧语言既要本色又要当行。简单地说，本色语言就是和本来生活面貌一样的俚质的语言，大家都说都懂。这种语言，富有生活气息。当行语言即适合舞台演出的语言。它顺口，有节奏，与舞台动作协调，既能使演员“上口”，又宜于观众“入耳”。本色、当行的戏剧语言都是浅显、明白、生动的语言，是最能够发挥艺术力量的语言。这是因为戏剧语言不同于古典诗文语言，一遍没懂可以再三再四阅览思索。戏剧语言则不同，观众没听懂，不容再唱或再说一遍。因此，戏剧语言应该服从艺术形式本身的需要，不能有深奥、典雅、晦涩的字句，而必须以观众明白理解为首要条件。只有这样，观众才能随着演员的表演去理解剧情。也

只有这样，戏剧的感染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通过对中国戏剧历史的研究及自己的戏剧实践经验，就十分重视戏剧语言的本色、当行。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①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首先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语言中，选择、锤炼戏剧语言，然后入剧。

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戏剧语言的基础，同时，也是戏剧的生命力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中国戏剧的发展史即可得知。文人书面语最初出现，就与人民群众的口语有一定距离。到了唐宋，文人书面语距离人民的口语就更远了。它较口语有其相对的保守性。白话是广大人民自己的语言，亲切、易懂、生动，有其相对的流动性。所以口语、白话的民间文学能够广泛流传。唐宋以来，白话文学的样式是多样的。唐时有俗讲、变文、参军戏等。宋代继承了这些形式而且还有发展，如杂剧、话本以及少数俗语词等。宋金之际，以北宋讲唱文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诸宫调及金院本，把起源民间的讲唱文学向前推进一步。宋金以来，新颖多样的民间文艺形式，在题材内容、体制结构、刻画人物、描写环境、乐曲组织、曲白结合、动作舞蹈、脸谱服饰诸方面渐趋成熟，为新的高级的戏剧形式——元杂剧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基于上述原因，于是更高级的戏剧形式，曲白相生的杂剧在元代应运而生了。（当然，杂剧的产生还有其它原因）全新的杂剧是民间文学范畴的艺术形式。在曲词和宾白的运用上，它继承了宋金讲唱文学的语言传统，采用了大量当时北方的口语方言入剧而

^① 李渔《闲情偶寄》。

成为戏剧语言，于是，方言俗语便能够大模大样地进入杂剧。显而易见，元代杂剧中，方言俗语的大量出现，是艺术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当时的社会来看，方言俗语进入杂剧，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产生、崛起、繁荣杂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元代最有影响的基础方言——北方的基本语言决定的。汉语在元代，有许多种方言。在同一种语言的诸多方言中，哪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是决定于某种方言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北方方言的基础是宋代的中原方言。辽、金、元都以今北京为首都。北京是辽、金、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就元代讲，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方言，在整个元朝社会是最有影响、最富有代表性的语言，因而它是元代社会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在当时是相对规范了的语言，在元代有着重大影响。它能普及那么大的地域，有那么多人使用它，这在文化、交通都很落后的封建社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此，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北方方言俗语进入杂剧，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另外，北方的汉族，千百年来与少数民族杂居，生活在一起。社会制度、生活风俗、语言文化都在互相影响着。异族的接触，在其开始阶段，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新鲜感，故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可塑性，影响着一切。少数民族豪爽单纯的特点，也影响着汉族的语言风格。据南宋笔记记载：金代汉“民既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亦与之俱化。……自过淮北皆然，京师尤甚。”^①女真民族在他们还未灭北宋，就已逐渐移民南下，在当时的都城东京和汉族杂居起来。据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莲莲

^① 范成大《揽辔录》。

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宋室南迁,中原地区的民族交融愈加频繁。元代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在各地作官,广大蒙古人民亦进入中原杂居,使交融更加广泛,各方面都在互相影响,而在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方面的影响更甚。北方的女真人、蒙古人逐步懂汉语,渐渐学汉语。《辽金元艺文志》载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就是用汉语写作的。如女真族作者箫观音的诗歌影响很大,李直夫与石君宝是著名的杂剧作家。蒙古族更多,脱脱、杨景贤等擅写诗文,杨景贤还写杂剧。阿鲁威是有名的散曲作家。还有,蒙古族的樊勃闡奚是扮演杂剧的名演员。同样,北方的汉人,也常说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据此可知,长期以来,北方人民除主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外,还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因此,我们在杂剧中能看到当时各族人民通用的部分少数民族语言。

方言俗语进入杂剧,与蒙古民族进入中原更有直接关系。由于语言、文字的原因,在文学艺术的交流中,蒙古人不能马上通晓中国的古文经典,一时还不能掌握文言文,首先只能接受简单、通俗、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官方文书中,一直运用文言,以示其庄严、崇高。而元代统治者在他们的“典章”、“圣旨”、“札子”等官方庄重的文书中却运用了很大一部分蒙汉杂揉的口语作为书面语。这种新鲜的语言,在统治阶级官方文书中出现,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官方文书运用口语方言,客观上起了在全社会提倡运用口语方言的作用。广大人民自不必说,敏感的文人作家便大胆地采用口语方言进行创作。鲁迅对元谕、诏敕运用口语方言与杂剧语言的关系有深刻的见地:“元谕用白话,我看大概是出于官意的,然则元曲之杂用白话恐也与此种风气有关,白话之位忽尊,便大踏步地闯入文言阵营里去了。于是就成了这样一